

# 试论郑观应的中学、西学观

谭 锐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南充 637002)

**摘要:**郑观应作为19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从拯救民族危亡的角度论述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中、西学观,并提出了比洋务派更全面的学习西方之道,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维新思想的传播及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郑观应; 中学观; 西学观

**中图分类号:**K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094(2003)03-0125-04

郑观应(1842—1922),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号倚鹤山人,或罗浮倚鹤山人,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地”,以拯救民族于危亡。郑观应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商业;二是设立议院,实行民主,做到君民共治,上下一心。而这一观点的哲学指导即是把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结合起来。因此,郑观应的中学、西学观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指导性观点,有着十分显著的重要地位。

## 1 郑观应中、西学观产生的社会背景

郑观应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对于当时列强对中国的全方位侵略及清廷的腐败、被动和落后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成为他中、西学观产生的社会因素。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打击,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尤其是中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被称为“古今之变局”。这种变局观在当时大致包含四层意思:(1)中国已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sup>[1]</sup>;(2)“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sup>[2]</sup>;(3)“近来边防移在海疆,群夷糜我腹心,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创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逾千万里,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城关,渺

无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sup>[3]</sup>;(4)“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sup>[4]</sup>。总之,中外格局已大变,不“应变”则无以自存,从而为学习西方之道提供了历史与理论依据。

19世纪中后期,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民族危机日趋深重。面对这种外忧日增的形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越来越感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sup>[5]</sup>因而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与此同时,以近代科技为主的西方物质文明,也随着鸦片、军舰和大炮源源输入中国。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及技艺、国情的著作大量出现,如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这极大地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而郑观应本人也因“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弊得失盛衰之由”。<sup>[6]</sup>所有这些都为其中、西学观的最终形成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 2 郑观应中、西学观的主要内容

郑观应的中、西学观,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 2.1 主以中学

郑观应的“中学观”主要表现为“道器论”。“道”即“圣道”(孔子之道),它是不能改变的,是治国的根本,“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sup>[7]</sup>“器”即西方的一切自然科学。郑观应曾运用《论语》中的“由博返约”的原理对二者加

收稿日期:2003-02-26

作者简介:谭锐(1972—),女,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专门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

• 125 •

以说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矚格致诸门，如一切汽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sup>[9]</sup>。故“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sup>[9]</sup>。在这一点上，郑观应深受王韬的影响。王韬认为：“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儒道也，亦人道也”<sup>[10]</sup>；“人类不尽，其道不变”<sup>[11]</sup>。所以，“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sup>[12]</sup>。可见，郑观应等都认定抽象的“道”寓于具体的“器”，无论“器”怎样变化无穷，“道”则永恒不变，从而反映出他们思想中浓厚的封建性。

除“道器论”外，郑观应的中学观还有另一层涵义。他在《盛世危言·西学》篇中针对当时有人“以为西法创自西人，或诧为巧不可阶，或斥为卑无足道”，引经据典“论证”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诸如天文学、地学、数学、物理、化学以及机器制造等，皆“出于我”，为“我所固有”，只是由于后来“学者矚虚而避实”，才使“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现在西人在“踵行中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造诣”，中国就应该重新学习，此“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即“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sup>[13]</sup>。这里的“中学”实质上是指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既然它是中国的“本有之学”，故应“主以中学”。

## 2.2 “辅以西学”

郑观应心目中的西学，与当时一般所谈的西学即所谓格致制造诸学有所不同。他在其早期作品《易言》中将“西学”分为：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sup>[14]</sup>。概而言之，“经学”指天主教神学；“法学”为古今政治制度；“智学”包含自然科学、哲学、心理学、文学等；“医学”则言及内外科、神经学、药剂学和产学等，这表明郑观应已不以格致制造为限，其“西学”已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但他此时对西学的划分，存在着笼统和模糊的不足。因此，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又将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类，而把经学排除在外，比前者又有了进步。他说：“今彼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则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则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

商贾、工技诸艺，皆则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也。”<sup>[15]</sup>

郑观应把“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类，这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中还是第一次，其涉及的内容较其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说的“西学”都为广泛。而且，他认为西学诸艺“皆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对乾隆皇帝以来封建士大夫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的传统保守狭隘观点的摒弃，反映了郑观应思想中的开明性。

与此同时，郑观应还把西方的“政教”放在了突出的地位。早在1884年他即明确指出“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sup>[16]</sup>至1892年他更进一步认为：“其（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sup>[17]</sup>郑观应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度列入“主”、“体”之中，不仅表明了其主张体用兼学的根本观点，也说明了是时的他除自然科学技术外，更看重西方学的社会政治、经济学说。

郑观应虽把西学视为医治“危疾”的良方而大力讲求，但也反对“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唯西学是尚。他主张“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惊他人；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sup>[18]</sup>，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学习西方。

## 3 “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与“中体西用”的相异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宗旨。它坚持中体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认为西用的目的正是为了捍卫和强化中体。相比之下，它与郑观应的中、西学观存着明显的分歧和差异。

### 3.1 对“道”的认识不同

洋务派虽主张因时而变，但决不能触动中国传统的纲常礼教和统治秩序。如曾国藩等人虽已意识到学习西方为“中国自强之道”，但又担心“器”变引起“道”变，便提出以“义理”统摄“经济”的办法，要求官吏士绅务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认为“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贲乎其中矣”。<sup>[19]</sup>曾氏所说的“经济”是为“经”邦“济”世之法，虽有因袭，亦可权变；“义理”即是儒学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解释和规范，其贯通古今，不能改变。再如张之洞也认为“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

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sup>[20]</sup>由此可见，洋务派的“道”即专指孔孟之道。而郑观应的“道”除圣道外，亦包含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同时，他还认为，“道”与“器”是“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sup>[21]</sup>，即道与器是相互统一、相互渗透的，所以“道”、“器”的某些内容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也是他将西方议院制归入“道”、“体”之中的理论依据。从这一点来说，郑观应对“道”的认识在内涵、深度上都远胜于洋务派。

### 3.2 对“兵战”与“商战”重要性的认识不同

洋务派一直认为西方各国之所以强悍而中国之所以落败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缺乏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sup>[22]</sup>。于此，洋务派提出了“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要以制器为先”的对策<sup>[23]</sup>，即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加强对新式武器的研制和学习，同外国展开“兵战”。至于商业，“中国立国之本在安农，……中国户口繁盛，而地产所出止足以养欲给求，故古来圣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在重农抑商，不尽务山泽之利。”<sup>[24]</sup>而郑观应虽很注重兵战，但更注重商战。他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故“习兵战不知习商战”。<sup>[25]</sup>同时，“兵战”的进行也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持。“今夫保民之道，莫先于强兵；强兵之道，莫先于富国。”<sup>[26]</sup>“况乎言富国者必继以强兵，则练兵、铸械、添船、增垒无一非耗费巨款……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sup>[27]</sup>所以郑观应认为，要达到真正的富强，应首先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在经济上战胜它。

### 3.3 对是否应行“议院制”的认识不同

“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sup>[28]</sup>这就是说，要发展科学技术与近代工商业以致富强，必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新的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在郑观应心目中就是有一定民主的君主立宪制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内政改革。而开设议院则是实行立宪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郑观应著《易言》便指出：实行议政制能使国家“长治久安”<sup>[29]</sup>。至著《危言》时，他又概括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

莫要于设议院”。“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sup>[30]</sup>而且郑观应还清楚地看到，设立议院以实行民主制度，还必须有与议院制相适应的一系列内政改革。因此，他从吏治、教育、用人、刑法、办报、盐务、漕务、治河、旱潦乃至救灾恤贫等方面提出了配套的改革措施，从而形成了完备的政治制度改革思想。而洋务派虽提出要学习“西政”，但其所说的“西政”只是指“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务、律例、劝工、通商”<sup>[31]</sup>，并不包括西方的社会政治学。对议院民主制更是坚决反对，认为“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难系之也”。<sup>[32]</sup>如果实行议院制，就是违反了三纲五常，违背了道统，只能“法未行而大乱作矣”<sup>[33]</sup>，陷国家于动乱之中。可见，洋务派向西方学习，是以维护清正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为前提的。

综上所述，郑观应的中、西学观涉及救国、发展实业及要求民主、改良专制等领域，虽然还带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但瑕不掩瑜，它毕竟启迪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发展，而且也为此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 注释：

- [1] 薛福成. 筹洋刍议[A]中国史学会编. 戊戌变法(一)[C]. 北京:神州国光社,1953. 159.
- [2] 曾纪泽. 日记[A]. 曾纪泽遗集[C]. 长沙:岳麓书社,1983. 344.
- [3] 周盛传. 拟覆陈总署筹办海防条议[A]. 中国史学会编. 洋务运用(一)[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71.
- [4] 王韬. 答强羽论[A]. 韬园文录外编[C].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00.
- [5]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A]毛泽东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70.
- [6] [7][17]郑观应. 盛世危言·自序[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33. 233. 233-234.
- [8] [9][21]郑观应. 盛世危言·道器[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34. 241. 243.
- [10] [12]郑观应. 易方(二十篇本)·跋[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67.
- [11] 王韬. 变法上[A]. 韬园文录外编[C].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12.
- [13] [15][18] 郑观应. 盛世危言·西学[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76. 274-275. 272-273. 273.
- [14] 郑观应. 易言(二十篇本)·西学[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01-202.

- [16] 郑观应. 南行日记[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967.
- [19] 曾国藩.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A]. 曾国藩全集·诗人[C].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443.
- [20] [32] 张之洞. 正权第六[A]. 劝学篇[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87. 86.
- [22] [2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卷 25. 北京: 故宫博物院影印, 1930. 9. 1.
- [24] 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等奏[A]. 中国史学会编. 洋务运动(一)[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252-253.
- [25] 郑观应. 盛世危言·商战(上)[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586. 241. 243.
- [26] 郑观应. 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282.
- [27] 郑观应. 盛世危言·商战(下)[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597.
- [28] 郑观应. 盛世危言后编·自序[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29] 郑观应. 易言(三十六篇本)·议论政[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103.
- [30] 郑观应. 盛世危言议院(上)[A].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313-314.
- [31] 张之洞. 设学第三[A]. 劝学篇[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121.
- [33] 张之洞. 变法第七[A]. 劝学篇[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135.

### On Zheng Guanyin's View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TAN Rui

(Xihu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Zheng, as one of the capitalism reformist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for the sake of the nation, discussed the view of taking Chinese learning as first place and western learning as subsidiary. He put forward a more complete way of western learning than the westernizers. He founded the theory of spreading and developing the capitalist democratic idea and reformatory idea.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View of Chinese Learning; View of Western Learning

责任编辑: 胡 蓉